

熊式一与中国京剧《王宝川》的文化翻译^{* 1}

马会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熊式一是 20 世纪上半期与林语堂齐名的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中国离散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将中国京剧搬上英美舞台的戏剧翻译家。然而,我国翻译界目前对熊式一的翻译活动及其成功英译中国传统戏剧《王宝川》的相关研究很少。本文描述熊式一近半个世纪的中英文翻译活动,考察熊译《王宝川》的文化翻译策略,探讨英译《王宝川》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英语世界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主要归于 3 方面:(1)译者将中国京剧改编为适合西方舞台演出的英文话剧;(2)巧妙的广告宣传以及赞助人的大力扶持;(3)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王宝川》翻译和上演的成功经验能够为当前中国戏剧走向英语世界提供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熊式一;中国传统戏剧;英译《王宝川》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2-0085-7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2.014

S. I. Hsiung and His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Lady Precious Stream*

Ma Hui-ju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the first English version of Peking Opera *Wang Baochuan* was translated by a Chinese playwright S. I. Hsiung in 1934. When it was performed on stage in London in the 1930s, it won huge success in UK. Later on, the English version *Lady Precious Stream* was adapted into different western languages and performed on stage in more than 4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explores Hsiung's translation of the Peking Opera *Wang Baochua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Aspects in terms of rewriting the plot and recreating the comic effects are examined with examples to analyze Hsiung'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handling cultural-related problems of this Peking Opera. Hsiung'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veal that in a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 if a translated text intends to be smoothly accepted in a target culture, the translator should reproduce the text on the level of culture as a whole rather than of the word or sentence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etics in the receiving culture when the translation is made.

Key words: S. I. Hsiung; traditional Chinese play; *Lady Precious Stream*

1 引言——被遗忘的戏剧翻译家

“西方人演京剧,最早是 1934 年,在英国伦敦演出了《王宝川》^①,译者熊式一。根据普郎科著的《东方与西方的戏剧》(1967),这次演出很成功。消息传到美国,纽约和洛杉矶也演出了这个戏。”(胡冬生 1986: 140) 雷丁大学的 Ashley Thorpe 博士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指

出,“这出戏《王宝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被中国学者译写、导演并且搬上伦敦舞台的中国传统戏剧”(Thorpe 2011: 81)。遗憾的是,对于最早将中国戏剧《王宝川》译成英语并搬上英美舞台的译者熊式一,长期以来,人们了解却非常少。即使文学界、翻译界知道熊式一其人其事的也特别少。近年来,熊式一作为“被重新发现”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国家的翻译和接受研究”(13BY041)、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京剧英译研究”(2015WYB029)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翻译认知过程之实证研究”(2016JT004)的阶段性成果。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而被学界认识。他三、四十年代在英国翻译的中国传统戏剧《王宝川》(2006)和创作的长篇小说《天桥》(2012)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出版。

“熊式一是与林语堂并称海外的双语作家,在英语世界撰写并执导戏剧的中国第一人。西方文化界有‘东林西熊’的说法——美国文化界佩服林语堂,青睐其《京华烟云》,英国文化界佩服熊式一,钟爱其《天桥》。”(陈子善 2012)然而,与林语堂相比,熊式一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在我国大陆却“严重滞后”(同上:3)。目前为止,我国对熊式一在英语世界翻译和导演的中国戏剧《王宝川》获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原因,仅有寥寥数篇论文(肖开容 2011,杨颖育 2011,彭金铃 2013)。本文尝试在较为全面地介绍和描述熊式一先生近半个世纪的中英文翻译活动的基础上,考察其在20世纪30年代将中国传统戏剧《王宝川》翻译和搬上欧美舞台的文化交流活动,重点探讨和研究《王宝川》英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以及熊译《王宝川》在英语世界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以期对我国的戏剧英译走出国门提供启发和借鉴。

2 熊式一的中英文翻译活动

根据龚世芬(1996),熊式一的翻译活动可分为3个阶段:(1)1923年大学毕业至1932年底赴英求学,为其汉译英国现代戏剧时期;(2)1933年抵英至50年代初,为旅居英国时期,也是英译中国传统戏剧时期;(3)五、六十年代移居香港至1991年去世,为自译其英文作品时期。

2.1 20年代——对英国现代戏剧的汉译

熊式一(1901-1991)为江西南昌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后相继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高校教授中英文课程,同时进行翻译和创作。由于没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按当时的教育部政策,他很难被聘为教授。1932年他决定赴英求学,到伦敦大学攻读戏剧文学博士学位。当时熊式一担任《现代》杂志的英国文艺通信记者,1933年1月该杂志对他赴英求学做过简短报道,称其为“努力翻译英国现代作家肖伯纳及巴蕾两氏全部著作之熊适逸氏”。可见,熊式一在赴英求学之前,已在中国文坛小有名气。他翻译过英国现代戏剧家肖伯纳和巴蕾的大多数剧本,部分发表在当时的大牌新文学杂志上。这一时期熊式一共翻译10部英文剧作,其中8部是英国剧作家巴蕾的作品,两部是肖伯纳的作品,主要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也

有一些发表在《现代》和《新月》等杂志上。1930年,他翻译的剧本《可敬的克莱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署名熊适逸。早期的戏剧汉译不仅使熊式一熟悉了西方戏剧,而且为他30年代将中国传统戏剧翻译成英语奠定基础。此外,在翻译英国戏剧的同时,他还翻译出哈代的小说作品《卡斯特桥市长》。

2.2 三、四十年代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英译

1932年末抵达伦敦后,熊式一原计划以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后来在其导师聂柯尔(A. Nicoll)的建议下,改为以中国戏剧史为研究对象。在1933年春的一次谈话中,聂柯尔建议熊式一“在中国旧剧中,找一出欧美人士可以雅俗共赏的戏,改译成英文话剧,看看可以不可以英美上演”(熊式一 2006:191)。在比较过中国京剧中“雅俗共赏”的多部传统戏剧后,熊式一决定选取有关薛平贵与王宝钏故事的传统京剧《红鬃烈马》将其改译为英文。1934年7月,他翻译的《王宝川》(*Lady Precious Stream*)由英国伦敦麦勒书局出版。同年冬由熊式一亲自指导的英语话剧《王宝川》在伦敦小剧场上演。演出获得巨大成功,3年间先后在英国演出九百余场,场场爆满。当时英国的各大报纸如《泰晤士报》(*The Times*),《格拉斯哥晚报》(*Glasgow Evening News*)、《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和《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等都对《王宝川》的演出进行报道,做出热情洋溢的评论,“或称其为‘小名著’、‘一本精巧雅致的书’、‘一本可用以馈赠特殊人物的好书’,或将其比喻为大自然中各式美妙的景物,如:争艳怒放的花朵、轻盈的蝴蝶羽翅、妙不可言的日落以及清新的草上露珠。有些文学评论家甚至认为《王宝川》‘具有一种精湛文化的标志’,译者为‘丰富英语文学’做出了贡献”(龚世芬 1996:261)。

《王宝川》在英国演出引发持续的中国戏剧热也波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1935年秋,熊式一和剧组接受美国剧团经理盖斯特(M. Gest)的邀请,到纽约百老汇演出。此后该剧在美国东北部的芝加哥、美国东部、中西部以及西海岸巡演达一年半之久,成为在百老汇上演的第一部中国戏剧。英译本《王宝川》也被翻译为欧洲多种语言。根据熊式一的孙子熊伟回忆“我祖父说他有一屋子(不同译本)的《王宝钏》”。与此同时,根据《王宝川》英译本改编的剧本也在瑞士、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爱尔兰等国演出,引发国际上的中国戏剧热潮(Hsiung 1939:176)。

在英译《王宝川》获得巨大成功的鼓励下,熊

式一随后将中国戏剧中的经典剧目《西厢记》译成英语,译本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由伦敦麦勋书局 1935 年出版。当时的著名诗人布特雷(G. Bottomley)在其译本序言中高度评价熊式一向西方介绍中国剧目的重要意义,认为译者凭借对原文的理解和忠实翻译,译文的措词造句“简洁、直接、清晰”(Bottomley 1935: X)。国外亚裔学者和汉学家也认为熊式一的翻译“既传达了中文原意,又通晓流畅”(夏志清语);译文“虽有种种差错,但并不坏”(闵福德语)。然而,由于受到二战前夕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英美评论界对《西厢记》的英译本反应冷淡,评论寥寥,也没有哪家剧院愿意将其搬上舞台(龚世芬 1996: 265)。此后,熊式一还翻译出版剧本《孟母三迁》(*Mencius Was a Bad Boy*),读者反响一般。

除翻译外,熊式一在这一时期还创作出 3 部作品:剧本《大学教授》(*The Professor from Peking*, 1939)、小说《天桥》(*The Bridge of Heaven*, 1943)和传记《蒋介石传》(*The Life of Chiang Kai-Shek*, 1948)。《天桥》自 1943 年出版以来,受到西方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英国作家威尔士称之为“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图画,描写了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熊式一 2006: 4)。小说一年内再版 4 次;次年又再版 4 次,1945 年再版两次,为他赢得英语世界“东林西熊”的美誉。

2.3 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中文自译

50 年代初熊式一在剑桥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和元代戏剧(1949-1952),任期满后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院(1952-1955),1955 年移居香港。在香港时期,除出版 20 年代翻译的巴蕾《难母难女》剧本,以及创作出社会讽刺喜剧《梁上佳人》外,熊式一的翻译活动主要是自译。他先后将自己早期创作或翻译的 4 部作品译成中文:包括《天桥》、《王宝川》、《大学教授》和《和平门》。在《天桥》译本的序言里,熊式一写道“《天桥》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马上就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捷克文和荷兰文等各种译本在各国问世”。但《天桥》的中译本却是在近三十年后由熊式一本人自译成汉语后才在香港、台湾两地与中国读者见面;大陆的简体中文版则迟至 70 年后的 2012 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在这一时期,他应香港艺术节组织者的邀请,将 30 年代英译的《王宝川》自译成中文,并将其搬上香港的舞台。1956 年《王宝川》的中译本在香港出版,2006 年中英文对照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熊式一还把自己早年用英文创作的《大学教授》和

《和平门》等自译成中文,两者皆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迄今尚未引进。对于熊式一自译作品的研究,目前仅有两篇论文,一篇是彭金玲对《王宝川》中译本的研究,一篇是台湾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蔡永琪撰写的《论熊式一自写自译》。

3 《王宝川》的文化翻译策略及成功原因

中国传统戏剧与英语话剧无论在内容上、结构上还是观众对剧本的期待上等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熊式一要想在伦敦的舞台上成功上演他翻译的剧本,赢得对中国及中国戏剧了解甚少的西方观众的认可,需要考虑到中英戏剧的差异、西方舞台演出的需要以及英语读者/观众的认知能力,根据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诗学规范对原剧本做出适当的文化改写。

3.1 从中国京剧到英文话剧的改编

在中国京剧舞台上,许多成功上演的戏剧剧本都不是艺术价值很高的文学作品。这是因为在京剧表演艺术中,剧本仅是提供故事情节、背景和人物活动的框架,演员的表演才是舞台演出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一个戏剧爱好者和研究者,熊式一很清楚这一点。之所以选择《王宝川》这一剧目作为英译的材料,目的性非常强“我当年写《王宝川》为的是试试看卖文能否糊口”(熊式一 2010: 92-93);“我之作《王宝川》,唯一的目的是想求一点小利”(同上: 104)。正是出于这种功利性目的,《王宝川》的英译从一开始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基于原作的改写。根据熊式一本人的回忆,30 年代在英国翻译《王宝川》时,手头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作为底本。而且,《红鬃烈马》这一剧目在当时的中国也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中文版本,每个剧组都有自己的演出版本,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熊式一翻译《王宝川》时主要是凭借他对中文剧本的记忆(Hsiung 1939: 176)。与熊式一处于同一时代的林语堂在评论《王宝川》英译本时指出:熊式一翻译、导演的英文话剧《王宝川》能够在伦敦获得成功,部分归功于原作特有的魅力,但更归功于译文语言的自然而然以及译者对西方戏剧表演技巧的熟稔。最重要的是,译者考虑到西方舞台演出的需要,对原作进行必要的改编。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像《王宝川》这样的剧本很少能够从头到尾地进行演出。整个中文剧本缺乏剧情上的统一和情节上的连贯,缺乏西方戏剧意义上的高潮和结局。考虑到这一差异,熊式一在翻译这一传统中国剧目的过程中,将王宝钏的故事改译为英文的 4 幕

话剧,从而保证整个剧本内容上的紧凑性和情节上的连贯性。英国汉学家白之(C. Birch)在谈到明朝传奇剧的翻译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我相信节译某些剧作的一些场景是有道理的。实际上,采取这样的英译方式和数世纪以来中国剧院经理人的做法是一样的,他们会挑出一些场景在舞台上表演,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折子戏。这可能是为英语读者翻译明朝传奇剧的最佳策略——进行选择性地翻译,伴随的介绍性内容可以把每个场景恰当地置于其戏剧背景当中,之后再挑战读者阅读三十几出或者四十几出的全本”(Birch 1990: 11)。按照西方戏剧的演出要求在翻译时对中文剧本进行合理改编不仅使译本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也是《王宝川》最终能够搬上伦敦舞台并且吸引观众的基础。可以说,译者的改编是该剧在英国舞台上演出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巧妙的广告宣传与赞助人的鼎力扶持

熊译《王宝川》在西方能够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译者对于译本的巧妙宣传以及译入语文化系统中赞助人的大力支持。在英译本的前言中,熊式一对读者“郑重”承诺:英译本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剧本。他强调说“在剧本中,我丝毫没有尝试改动原文的任何东西。下面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文剧本,跟中国舞台上演出的版本丝毫不差。除语言外,剧本中每个微小的细节都是中国的,就我本人有限的英语而言,我尽其所能地做了满意的翻译”(Wang 1935: xvii)。另外,剧本的副标题“根据传统风格英译的中国古老戏剧”也进一步强调这一点。然而,对比研究中文剧本和英文译本可以发现,译者前言及封面中的所言基本上是一种广告宣传。熊式一本人晚年在自传中的回忆也证实英译本前言中所言是一种“骗人”的商业宣传“这东西(指《王宝川》英译本)本来就用不着把原本奉为规范,所以我虽然说这是照中国旧的戏剧翻译的,其实我就只借用它一个大纲,前前后后,我随意增加随意减削,全凭我自己的心意,大加改换……”(熊式一 2010: 30)。对于熊式一“随心所欲”的翻译改写,如果考虑到翻译《王宝川》的背景和动机,其实并不难理解。熊式一之所以翻译《王宝川》,是因为听从聂柯尔的建议:要翻译一出中国戏剧,将其搬上英国舞台,并从中获得商业利益。从一开始,熊式一就决定选取一个商业上有可能在西方舞台上获得成功的“雅俗共赏”的通俗剧,而不是文学价值高的中国经典戏剧如《西厢记》。在《大学教授》英文版

的后记中,他在回忆《王宝川》的翻译和演出时写道“我译《王宝川》的唯一理由是商业目的;如果能够取得些成绩,不论有多么令人满意,那都是纯粹的运气。然而,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我则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地失败”(Hsiung 1939: 168)。在翻译过程中,为保证剧本商业上的成功,熊式一经常跑到伦敦的各大剧院去观摩英文戏剧的演出,观察观众对上演戏剧的反应。因此,明确的翻译目的、充分的前期准备和精心的广告宣传是《王宝川》英译本和舞台演出成功的前提。

此外,《王宝川》英译本和舞台演出的成功与译入语文化系统中赞助人的支持也密切相关。当时英国著名的文人学者在为该译本撰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剧本。在《大学教授》(英文版)的后记中,熊式一提到《王宝川》有两个“教父”和“教母”。教父之一是为《王宝川》英译本作序的亚柏康贝(L. Abercrombie)。亚柏康贝是伦敦大学著名的戏剧研究专家和诗人,经常参加当时有名的摩温戏剧节,并受邀发表演讲,在戏剧界有广泛的影响。在《王宝川》序言中,他高度赞扬这一剧本,以亲身体验讲述他本人阅读《王宝川》英译本的愉悦感受:译笔灵巧优美,剧本读起来好像是一出轻松的浪漫剧。剧本的内容更是引人入胜“熊先生魅力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他提供给读者想象中的舞台那些令人愉快的表演技巧;而在于他展示给我们剧中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言谈、举止让人着迷,是他们的这一切让我们陶醉其中”(Hsiung 1934: viii)。他举例说,最让他着迷的是在第一幕中宰相王允对观众说的话“今天是新年。我想该好好庆祝一下。天好像要下雪,我建议花园里举办个赏雪会”。亚柏康贝感叹道:“赏雪!这正是熊先生对我们西方人的头脑施加魅力的精华所在。他笔下那些迷人的人物有一种我们没有的秘密,即如何生活的秘密。这也正是我们在进入到他们生活与命运的传说中时,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宰相新年园中赏雪吟诗的世界并非幻境,它不会发生在唐宁街上,但熊先生的这个世界、这个有着‘宝川’之名的年轻女子的世界,是一个精致、得体的真实存在,它显示出的是一种深刻的人性的真实”(同上: ix)。亚柏康贝虽然从译者那里了解到译本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翻译,也知道原剧在中国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是他仍旧热情洋溢地赞美说“对于绝大多数读者(包括我本人)来说,《王宝川》是一个用英文写(而且写得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王宝川》英译本显示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同上)。

此外,《王宝川》英译本还有一个“教母”——当时英国笔会主席斯科特(Donson-Scott)夫人。她是最早阅读《王宝川》英译手稿、并肯定该译本能够获得成功的英国人。当熊式一告知亚柏康贝很欣赏他的剧本后,她坚持说“那不行,那一句话是不够的!他一定要有言必有行”(Hsiung 1939: 167-168,熊式一 2010: 104)。可以说,正是在她的提议和坚持下,《王宝川》英译本才得到亚柏康贝的鼓励和支持,为当时在英伦尚默默无闻的中国学子的翻译剧本撰写热情洋溢的序言,为该剧本的出版和上演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宝川》能够成功搬上伦敦的舞台则要归功于另外两个赞助人:剧作家和演员菲尔德(J. Field)和剧团经理普锐丝(N. Price)。作为剧作家和演员,菲尔德对熊式一剧本的高度肯定和竭力推荐使得剧本能够被伦敦的剧团经理接受。而人民国家剧团的经理普锐丝女士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包括前期资金的投入以及向友人租借中国的演出服装等,也使该剧能够在短短5周内与伦敦的观众见面。这也是熊式一在后来的回忆中诚恳地尊称他们为剧本能够在伦敦成功上演的教父和教母的原因(Hsiung 1939: 168)。

3.3 对原剧本的改写

考虑到该剧目在中国是一出文学价值并不高的商业剧,他从未打算忠实地翻译剧本。他的翻译,充其量来说,是一种基于中国戏剧故事的创造性英文演绎。用林语堂的话来说:熊先生绝不是仆人式的译者,而是一个创造者,他有一个欢快年轻人的热情,对直译的准确性毫不在意。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写出那么漂亮的英语。你读几页英文,就知道他的译文绝不是柏林的教授或博物馆员的翻译,因为这些人的翻译总是要求事实确凿、准确,讲究知识性,但他们的翻译语言缺乏神韵。原剧诙谐幽默的语言在译文中都得以保存,基本上可以说是译者的再创作。熊先生的译文大胆、灵活。我粗略估计,这个译本15%是熊先生的创作,85%是对原文的直译。通过对比阅读译文和相应的中文版本,笔者认为林语堂的评价相对保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熊式一的“翻译”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是一种典型的创造性改写。

3.3.1 内容上的改写

中国京剧和西方话剧的最大不同在于舞台背景安排上的差异。京剧舞台不讲究真实场景和情景的再现,“虚拟”是京剧表演艺术的一个鲜明特色。京剧舞台上频繁出现的检场人与强调现实主义的西方戏剧截然不同。正是由于这一不同,英

译《王宝川》在每一个场景或人物出场前,都增添原剧中没有的对剧情和剧中人物的介绍。添加的部分虽然多数是背景介绍性内容,却同时又能够使读者读来感觉愉悦。它们一方面能够帮助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西方读者熟悉中国舞台上的场景、剧情和人物,另一方面又为演员的演出提供一个蓝本。例如,在第一幕的开始,译本增添约四百字的剧情说明,介绍中国传统舞台上的背景安排以及人物装扮等内容(如剧中人王宰相戴黑色长髯表示他不是反面人物)。可以想象,没有这样的说明,西方人很难读懂中国戏剧。另一方面,这些不同于西方剧本的舞台说明也因其东方特色和情趣吸引西方读者。亚柏康贝在《王宝川》的序言里提到中国戏剧舞台上的非现实性,认为剧中“虚拟的现实”再现出中国舞台表演长期以来一直严格遵循的美学传统(Hsiung 1934: viii)。

除因中西舞台表演艺术上的差异所做的增添外,《王宝川》英译本在内容方面也因客观和主观等因素影响进行多处改写。任何一个译者都不是在真空中翻译,翻译文本必然受到译者的思想意识和所处历史环境的影响。熊式一在中译本的序言中说“我对迷信,一夫多妻制,死刑,也不主张对外宣传,故对前后剧情,改动得很多”(熊式一 2006: 192)。例如,王宝钏故事的中文版本虽然众多,但几乎每个版本在开始部分描写的都是神力怪乱的现象,显示宝钏挑婿的绣球之所以落到叫花子薛平贵的身上,是命运使然。作为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熊式一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思想的表现,因而在译本中删除神力怪乱的现象。同时,在译文第一幕中增加王宰相在家中宴请女儿女婿,打算借机说服小女儿宝川早挑如意郎君这一剧情。在饮酒赏雪、比武作诗的过程中,译者将在王家做花匠的(而不是在街上卖艺的)男主人公薛平贵介绍出场,并让他充分展现自己的文武才能,因而被王宝川看中,并最终由她自己出面安排,在踢绣球时有意把绣球抛到意中人的身上。正是因为宝川自主选择未来的丈夫,所以后来她才能够在寒窑中苦守18年,等候丈夫衣锦还乡。通过这样的改写,译本既剔除译者不愿意对外宣传的迷信糟粕,又把宝川对平贵的赏识,说得合乎情理,保证剧本整体上风格统一和逻辑通顺。

另一个明显的改写是译本中增加一个人物——外交官。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在寒窑苦等丈夫18年的女主人公等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丈夫荣归故里,而且还有他在西凉国娶的公主。然

而,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度在辛亥革命后已被废除,而五四运动提倡的男女平等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译者认为原剧中的一夫多妻是糟粕,不适合对外宣传,所以译本通过添加人物外交官,由他出场解决剧本中遇到的这一难题:把薛平贵本来需要迎娶的西凉公主变身为他的妹妹,巧妙避开一夫两妻的问题。

总之,改写实际上是译者的创造性写作,是原文所无的内容上的更动。但是这种变化,无论从剧情结构的完整性和合理性上,还是在内容的时代性上,都是成功的。译入语国家的专家学者(如亚柏康贝)高度评价译文添加的王宰相一家花园饮酒赏雪的内容以及英国皇室亲莅剧场观看演出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3.32 幽默语言的创造性“再现”

剧本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翻译。一般的文学翻译在处理原文的幽默语言时,既可以采取贴切原文的直译,然后添加文内或文外注释;也可以采取贴近译入语读者的创造性灵活翻译,用译入语文化中的幽默来替代原作中幽默。然而,在戏剧翻译,特别是演出本的翻译中,在处理幽默语言时,前一种翻译一般都被摒弃;而创造性的灵活翻译虽然考验译者的语言驾驭能力,却是演出中最受演员和观众欢迎的亮点。《王宝川》英译本及其舞台演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译者对原剧中幽默语言的成功创造性“再现”。请看下面一段经典的对白:

(公主:……到了他国地面,说话要和气点。)

马达、江海:是。老头请呢。

莫将:老头不玩火球。

马达、江海:老将!

莫将:老姜到菜市买去。

马达、江海:皇上!

莫将:黄鳝上鱼店里买去。

马达、江海:主子!

莫将:肘子要到肉店里买去。你们两个人,长得人不人,鬼不鬼,也配长了两条仙鹤腿!快回去,换一个好看一点儿的来说话罢!

译文1(林语堂的直译):

Ma & Kiang: Hey, old man on the rampart!

Mu: The old-man does not play a fire-ball.

Ma & Kiang: My old General!

Mu: Old giner? Buy it at the shop for selling salt and oils.

Ma & Kiang: My Emperor!

Mu: You want yellow eel? (here the Chinese

pun is lost in the translation) . Go and buy it at the fish market.

Ma & Kiang: My Lord!

Mu: You want pig's tripe? Go and buy it at the butcher's. Look here, you two fellows! You look neither like human beings nor like devils, with you pairs of shaky legs looking like those of stork. Go and get someone more presentable to talk with me.

译文2(熊式一的创造性翻译):

Ma(calling aloud) . Hey, my old man!

Mu. Old moon? We can't see the old moon until midnight.

Kiang. My old General!

Mu. Old ginger? Buy it at the market where vegetables are for sale.

Ma. My king!

Mu. There is no kinsman of yours in China.

Kiang. My master!

Mu. Mustard? Go to the grocery for it!

Ma. My Lord!

Mu. He is in heaven.

Kiang. My Emperor.

Mu. You are empty? This is not an eating house! What are you two doing here? You are too ugly to be called human beings and certainly too ordinary to be called devils; and the most peculiar thing about you is how did you get a pair of legs like those of a stork? Go back and get someone more presentable to talk with me! (Wang 1935: 96 - 97)

上面的对白是西凉国的两位副将跟随代战公主追赶薛平贵至中国边界后跟守关的莫老将军的一段对话。原剧中莫老将军故意装耳背,对对方的问话答非所问,因而制造诙谐的谐音幽默对白:老头请呀—老头不玩火球,老将—老姜,皇上一黄鳝,主子—肘子。熊式一没有直译汉语的谐音幽默,而是另起炉灶,按照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创造出英语中的谐音幽默: oldman(老人)—old moon(老月亮), old general(老将)—old ginger(老姜), king(大王)—kinsman(亲眷), master(主人)—mustard(芥末), emperor(皇上)—empty(饿),从而生动再现出原剧人物对话的谐音之趣。林语堂在1935年的评论中也切中肯綮地指出:此处的翻译充分证明熊先生的成功是应得的。

除创造性地再现原剧中人物对白的诙谐幽默外,熊式一还在英译本中有意添加一些“佐料”段子。比如,让不学无术的二女婿魏虎将灵感(in-

spiration) 误听成淋汗(perspiration); 让剧中人物故意说一些与剧情不相关, 但却能够逗乐观众的话(如“我又不是对你讲话, 我是对着台下的人演戏呀”。“这出戏一点也不好, 尤其是这一幕, 简直专和我为难”等)。林语堂认为这些证明熊式一很好地将中文转换为英文的诀窍所在, 也是英译《王宝川》能够在海外舞台受到热烈欢迎的重要原因。

4 结束语

对于熊式一英译《王宝川》在英美舞台获得成功的原因, 我国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熊译本在保留、传递中国文化特色的同时注重语言上戏剧演出的效果(彭金铃 2013: 105); 另一种认为熊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所知寥寥而产生的好奇心与猎奇心理”(江棘 2013: 74)。本文在梳理熊式一近半个世纪的翻译活动的基础上, 从多角度考察熊译《王宝川》的文化翻译策略, 认为英译《王宝川》的成功主要依赖以下3个方面: (1) 译者对现代英语戏剧的熟稔, 能够将传统的中国京剧成功改编为适合西方舞台演出的英文话剧; (2) 巧妙的广告宣传以及赞助人的大力扶持吸引原本对中国和中国戏剧一无所知或“所知寥寥”的目标读者和观众; (3) 采用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 内容上的改写符合西方诗学的期待规范, 而原剧语言上的诙谐幽默又通过多种手段得以在译本中创造性地“生动再现”。在我国政府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 探讨熊式一英译《王宝川》的文化翻译策略及其在海外舞台上成功上演的经验能够为中国戏剧走向英语世界提供启发和借鉴。

注释

①在我国学术刊物及报刊杂志中提及熊式一 20 世纪 30 年代用英文翻译和导演的中国戏剧 *Lady Precious Stream*, 通常有 3 种中文译名《宝川夫人》、《王宝钏》与《王宝川》。第一种是直译, 第二种采用的是中国戏剧故事中女主人公王宝钏的名字, 第三种则是熊式一本人对其英文译本回译成中文后采用的译名。对“王宝川”这个译名, 熊式一在《王宝川》(2006) 中文版序中解释说: 许多人问我, 为什么要把“王宝钏”改为“王宝川”呢? 甚至于有人在报上说我的英文不通, 把“钏”字译成“Stream”。二十几年来, 我认为假若这个人觉得“钏”字不应改为“川”字, 也就不必和他谈文艺了。近来

我发现了许多人, 一见了“王宝川”三字, 便立刻把“川”字改为“钏”字……就中文而言, “川”字已比“钏”字雅多了, 译成了英文之后, Bracelet 或 Armlet 不登大雅之堂, 而且都是双音字, Stream 既是单音字, 而且可以入诗”(2006: 191-192)。所以, 本文谈到熊式一翻译和导演的该中国戏剧时采用译者本人使用的译名“王宝川”, 但在直接引用他人时, 则保留引者所用译名。

参考文献

- 陈子善. 关于熊式一《天桥》的断想[A]. 天桥[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 龚世芬. 关于熊式一[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6(2).
- 胡冬生. 谈戏剧《凤还巢》英译本[J]. 读书, 1986(9).
- 江棘. 戏曲译介与“代言人”的合法性——20世纪30年代围绕熊式一《王宝川》的论争[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3(2).
- 彭金铃. “一颗头等水色的宝石”——熊式一英译《王宝川》成功因素探析[J]. 戏剧文学, 2013(1).
- 肖开容. 从京剧到话剧: 熊式一英译《王宝川》与中国戏剧西传[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
- 熊式一. 王宝川[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6.
- 熊式一. 八十回忆[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0.
- 熊式一. 天桥[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 杨颖育. 镜中之像: 王宝川还是王宝钏——熊式一英译《王宝川》的改写与变异[J]. 四川戏剧, 2011(2).
- Birch, C. Reflections of a Working Translator[A]. In: Chen, E. E., Lin, Y. F. (Eds.),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Bottomley, G. Preface[A]. Hsiung, S. I. (trans.).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5.
- Hsiung, S. I. *Lady Precious Stream* [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4.
- Hsiung, S. I. *The Professor from Peking* [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9.
- Thorpe, A. Chinoiserie and Subalterneity in S. I. Hsiung's *Lady Precious Stream* [OL]. <http://www.soas.ac.uk/sci/events/seminars/19nov2012-chinoiserie-and-subalterneity-in-si-hsiungs-lady-precious-stream-1934.html>, 2014-10-23.
- Wang, S. F.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5.